Transtext(e)s Transcultures 跨文本跨文化
Journal of Global Cultural Studies

1 | 2006
Varia

自传式的理论写作

Autobiographical-like theoretical writing

Zhanchun GENG

Édition électronique

URL :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transtexts/187>

DOI : 10.4000/transtexts.187

ISSN : 2105-2549

Éditeur

Gregory B. Lee

Édition imprimée

Date de publication : 1 mai 2006

Pagination : 100-107

ISSN : 1771-2084

Référence électronique

Zhanchun GENG, « 自传式的理论写作 », *Transtext(e)s Transcultures 跨文本跨文化* [线上], 1 | 2006, 上线日期 13 septembre 2009, 浏览日期 20 avril 2019. URL :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transtexts/187> ; DOI : 10.4000/transtexts.187

理论从西方旅行到中国，问题语境发生了转移，批评对象产生了错位。理论的重新语境化，批评对象的重新确认成为必要。引用自传性经验可以成为我们“副署”一个在先理论的方式。这是注重引用自身经验、社会记忆和个人生活情景的一个理论动机。它意味着将我们的被动历史、或历史滞后性感受以及经验的混杂和异质性，引进理论语境进行初始的理论化。自传式的理论写作是理论场域中的迟到者的修辞学。以副署的方式赢得不同，赢得在问题上的自传式的署名。

Lorsque la théorie voyage de l'Occident vers la Chine, le contexte des problèmes se déplace et la critique manque sa cible. La recontextualisation de la théorie et la redéfinition de l'objet de la critique deviennent alors indispensable. La référence à une expérience personnelle de type biographique pourrait devenir un moyen de « contresigner » des théories du passé. Il s'agit de privilégier l'expérience personnelle, la mémoire sociale et le context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tant que mobile de la théorie. Cela signifie qu'il faut intégrer au contexte théorique notre histoire subjective, le sentiment du retard historique et l'expérience de l'hybridité et de l'altérité afin d'effectuer une théorisation initiale. Dans le champ théorique, la dimension personnelle et littéraire de l'écriture théorique est la rhétorique des retardataires. On gagne autre chose par le moyen de la contresignature : sa signature personnelle dans les problématiques.

Theory has journeyed from the West to China, the interrogatory linguistic context has changed, the critical object has been displaced. Theory's linguistic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the affirmation of the critical object constitute a necessity. The use of autobiographical experience could constitute a means of "countersigning" pre-existing theory. This is a theoretical motivation for stressing the use of self-experience, societal memory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individual life. It implies importing our passive historical, or historically straggling sentiments and the mixity and heterogeneity of experience into theoretical language and engaging in an initial experimental theorization. Autobiographical-like theoretical writing is the rhetoric of the latecomer to the theoretical domain. With the countersignature style what is obtained is different, it is obtained on the autobiographical-like signature of questions.

在检索自己以往文字的时候，我发现它们越往后就越是随笔化。这也许是一些年来“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吵”的结果。也许是文学的诱惑（它发生在童年时代），叙述的诱惑，倾吐内心沉默声音的渴望，即使在更理论形态的写作中，我也无法抵抗“我”的在场的诱惑：使用个人经验，征引个人感受、印象与记忆的诱惑。尽管我知道：在越来越复杂的知识地图上，个人经验成为一种范式、一种可信知识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引用自我经验、生活场景与引用各类书籍对我具有同样不可或缺的引文价值。这是一种既是“自传式”、又是“理论与批评式”写作的诱因。这似乎是一种矛盾：一种自传式的理论写作。

这种写作既非文学的，或仅只是借助理论思考的文学写作，也非哲学的，借助个体经验或文学方式的哲学写作。它只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企图：想用一切方法写下一切的愿望。当然这既是不可能又是无法终结的事情。自传式的理论写作与自我的重要性与否无关，而是与真实性的愿望有关。

虽然我对这样的写作既未想清楚，也未写得令人满意，可我也不能装作这种写作方式或想法是首创的。德里达（Derrida）（有时在我看来不该是他）在对文学的建制所做的思考中已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梦想：“直到今天，我心中依然有一种执著的欲望，用回忆的形式，不间断地记录下发生的事——或未能发生的事。我总想斥之为诱惑的东西——即总记或总括——不正是维系我生命的动力吗？”¹我也感知到这样的欲望，无论理论与批评写作、无论学科划分机制或者话语类型已经把我的写作拉向了什么地方，写作中仍然存在一种持续的诱惑，回到写作的文学性的动机中来。

这种“回忆和总括”，这种“内心集语”的写作，既包含“镜像”式的叙述，又是“思辩的”话语。它蕴涵着历史性的记述，文学的虚构与哲学反思。（这种区分不是愚蠢的吗？）它渴望以一种独特的主旨往返于文学与哲学之间，和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文体保持着互文性。这种写作既是对固有文体类型的一种分解，又是一种“极度总括的过分行”。德里达谈到他所感兴趣的第一批文本就是这种类型，其中包括卢梭（Rousseau）、纪德（Gide）和尼采（Nietzsche）。它们是一些明显具有自传性的文本。它们既不单是文学，又不单是哲学，而是属于“内心集语”或者是“自白”话语。他们用思辩的语言谈论问题，又对我们吐露心扉。这些一面“用第一人称讲话的哲学家”（还应加上《论语》、《庄子》等文本），一面又在增加“专有名称、面具和署名”。它不肯放弃个人内心的声音，又不肯放弃“运载这些声音的‘文化’”。德里达说：“在这一点上，包含各学科的诱惑变得与自传体不可分割了”。应该说“包含各学科”是一种勉强的说法。使用个人的声音，又不放弃个人声音的文化背景，这

¹雅克·德里达（Derrida）：“访谈：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下同，见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种声音与别的声音的互文关系，这种“总括”式的表述并非一种学科上的野心，而只是力图用一切形式写出一切的写作欲望。没有个人的声音或“面具与署名”，理论写作就成为一种知识复制和文化的转运，但是如果没有运载个人声音的知识系统，理论写作也就失去了它的学科疆域。

人文学科在现代学科体制所遭遇的命运是与“总括”愿望相反的“区分”机制，它区分历史记述、文学虚构和哲学反思。即使在文学学科内部也已经作出了更细致的学科区分，被区分的不同学科拥有自己的理论概念、历史范畴和话语形态，并且因此也使得这些学科在单独使用它们的概念和话语时失去其应有的思想力量，以此减弱了人文社会学科对社会历史的总体语境的回应能力。甚至只有回到“自传性”的叙述，我们才能赋予历史记述以生命，给予思想概念以活的历史语境，并且有可能使文学叙述成为真实思想的一个起源。

在学科区分的机制下，文学话语仍然保持了“总括”的意图，再现“内心集语”的可能性。文学之所以是人文学科的写作形式中应该保持的特性，是因为“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文学作为历史性建制有着自身的惯例和规则，但文学又有着摆脱这种惯例和置换规则的规则，创造和创新是它的最基本的规则，在德里达看来文学仍然具有或者至少具有质疑“立法权”的功能，“甚而去怀疑自然与制度、自然与传统法、自然与历史之间的传统的差别”，现代形式的文学建制是与民主社会里可以“讲述一切的授权”联系在一起的。

有时候，“讲述一切的自由”是一种十分有力的政治武器，但这种批判的武器又可以作为虚构而顷刻间失效。正像鲁迅在谈到丑角时所意识到的，以文学虚构形式说话就像鼻子上涂了油彩的丑角，他可以说常人所不能说的话，然而他的话永远不会被人们认真对待，他的话语有效性和权威性又被他的喜剧风格、叙述虚构和快乐色彩所取消。无疑鲁迅选择了更严肃的话语形式：“投枪和匕首”，而越来越多地放弃了虚构形式。尽管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内心为此隐隐感到遗憾。面对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语境中德里达认识到，文学的批评作用主要地属于语言方面。并且，“作家也很可能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有时候，他可以——我甚至要说他必须——要求某种不负责任性，至少是对于意识形态机关，——这些权力机关总是企图把他召回到对于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机关十分明确的责任上来。这种不负责任的职责、这种拒绝就自己的思想式创作向权力机构作出回答的职责，也许正是责任感的最高形式”。这些认识我们在七八十年代曾经产生过，它在我们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比在西方语境具有更真实的策略性。

在今天的语境中，文学决不是可以使我们放心使用的话语、文体或名称，它的无责任感已经不是策略而是变成了处境。文学已经成为一种软弱无力的经验。如果说文学话语曾经充当过“先知”和“丑角”两种功能类型，那么现在，文学话语在最有效的情况下，也在滑向“丑角”话语，即从先知般的启示与立法的话语，下降到丑角式的嘲讽与愉悦性话语，就像目前的理论与批评已经变成智慧的快乐或文本的欢快性话语。现在，不是从文学话语的有效性而是从文学的危机经验中引发了更具有批判性的问题。理论与批评转向文学的形式问题，既是文学危机的一个征兆，又是应对危机的策略。这些问题是：经验不仅进入叙述，而且影响着叙述结构，叙事话语和叙述形式又是怎样重塑经验，或如德里达所关心的处在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一些问题，言语与书写的关系、文学建制与社会政治空间等——理论本身更具有社会批评的意义，更能够

从社会学的角度把文学同它严肃的责任与后果摆在一起。

可以说，在今天的文学经验中，自身没有包含这种危机经验的文学写作已经不使敏锐的阅读感受到兴趣。一般的虚构叙述作品并不唤醒特别的兴趣。对日常生活一般性的再现经验也不令人感到特别的阅读渴望。但当“虚构”——不是细节而是叙述结构上的虚构因素浸入了“真实”事件的叙述，或者修辞形式和隐喻结构引人注目地进入了哲学与历史叙述，或者当文学反讽性地模仿了历史与哲学的某种形态，虚构与修辞作为文学性就表现了特别的魅力。因为在历史写作与哲学或理论写作中，虚构与修辞、甚至叙述本身都表现为一种被压抑的欲望，然而却被禁止和阻断了。叙述虚构和修辞学在哲学与历史中挑战并揭露着“哲学”与“历史”的东西。

在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文学自身的危机经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一方面引向了被称为理论的写作，一方面被引向了历史与哲学的写作之中。时常这只是表现在不同学科领域里的同样的理论问题。文学终结的疑问变成了耀眼的理论，文学的危机经验构成了具有活力的思想。文学的叙述、虚构与修辞成为最具有解构性的策略，不论文学表述什么样的观念与主题，文学叙述同时伴有的修辞就是一种解构。同样的力量在于，文学的修辞与虚构又是建构的力量。德里达认为，写作的经验即使不是一种道德或政治的职责，它也受一种律令的支配：“为独特的事件提供空间，以不再存在于理论知识中的写作活动的形式创造某种新东西，依照新的表述愿望的声明专心于一种诗歌——文学的实行性，这种实行性至少类似于允诺、命令或者制定或立法活动的实行性，后者不仅仅是改变语言，或者说它在改变语言的过程中还改变更多的东西。”对文学写作来说，每当有文本的享受与文本的快乐时候，就有灵验的“解构”，修辞就是解构，解构是撤消压抑，释放被禁止的（文本的）享乐。“文学会撤消压抑”。文学史总是处在修改其规则的过程中。文学是建制和蛮荒同时存在的领域。在一个建制内原则上允许对整个建制提出疑问，或者加以终止。

与此同时，理论自身更多地表现为文学，理论表现为随笔形式，表现为话语上的“总括”或者内心集语，在我所关心的那样一批文本中，理论写作中增加了对经验的描述和叙述。理论（以及哲学与历史）更接近文学，不是指文学在文体上的任何优越性，而是指在与语言的关系上：文学描述了特有的经验世界，它关注没有概念的特殊性，文学是“词语的唯物主义”。在与经验世界的关系上，理论写作释放了被禁止的叙事欲望：不受约束的观察，多义的细节和片断的场景，更多地进入了理论叙事之中。这样的理论叙述使经验描述成为思想的现场，它促使人们思考现象的诱发力，以及细节和事物的多义性。文学提供了最原创的“现象学”方法，在一种描述或叙述拥有哲学的命名之前，在确定的“哲学主题”出现之前，“文学经验——写作或阅读——是一种‘哲学’的经验”。这样的理论写作应该保持着一个“描写性的主题”，以便达到认识的敏锐时刻。

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把握“现在”的能力，和描述事件的“现在进行时”的魔法，文学表现为对现时性或“现在史”的诊断。它意味着这样一种能力：现实是一个不断移动自己的无法捕捉的弥散的对象，文学以修正自己话语的方式与这个经验同步。文学是一种历时的修辞学，也是认识论转义的运作或“转义认识论的科学”。现实是一个否定性的时刻，而诗人所提供的恰好是关于“当下时刻的知识”，在这个当下时刻，事物的联系被认知。与固有观念相比，与固定的文体或理论命题相比，真实的文学是针对固有观念的启蒙，是针对非思语言的启蒙，也是对文体成见的启蒙。与大多数学科相比，文学的研

究对象是最缺少稳固性的，它研究的是活的现实，是每天在人们的鼻子底下变幻不定的“现实性”，因此只有修辞描述或叙述可以作为研究这个对象的灵活方法。

目前最吸引思想理论的是这样一批文本：它们都表现为对文学建制的危机意识，表现为对“文学的传统样式的终结”十分敏感的文本。这样的文本是具有批评意义的话语实践。用德里达的话说，文学的“历史的建构就像一个根本未存在过的纪念碑的废墟。这是一种毁灭的历史、一种制造事件以供讲述并将永不出现的记忆的叙述”。这些文本形式多种多样，但都不再属于单纯的文本，不单是文学文本了。用布朗肖（Blanchot）的话来说，到了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小说，没有诗歌，也没有哲学，只剩下原始的写作。布朗肖的话并不意味着写作形式或话语形式的同化，不是期望所有的文体变成同一种文体，而是寻求每一次写作行为之间的差异，每一个作品之间的异质性。这些文本集中了这样的意图：写作以便记下时代的独特性经验或者使之发挥作用，同时对文学建制或语言建制进行质疑与更新。

与我们一生中经验的、想象与感受的相比，尤其是与我们的阅读相比，话语的某一类型或某种单一的文体所允许我们讲述的，显得十分狭隘。它使我暗中羡慕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然而又只是一种有限的个人话语的写作。德里达预言了它，“然而这种历史的、语言的、百科全书的浓缩，仍然是与绝对单独的活动、绝对单独的署名分不开的，因此也是与一个日期、一种语言、一个自传式的署名分不开的，在最简要的自传文字中能够收集到历史、理论、语言学、哲学等文化的最大潜能——这的确是使我发生兴趣的地方。”

在这里，署名是一种自传性的要素，署名意味着使用个人记忆、独特的经验与回忆；署名意味着个人独有的叙述语气、个人的修辞学等等。署名深刻地意味着置身于自己所表述的问题与经验之中，表现为思想理论对经验世界的在场。“一个自传式的署名”意味着这样的写作：避免理论命题和知识符号的巴洛克化的复制与传播，希望把理论命题置于自身的经验语境。使理论与经验相互参照、相互纠正与质疑。自传式的理论意味着保持具有抽象危险的理论所应该具有的语境意识，保持对置身于其中的更大的历史语境的敏感。在引用任何他人的理论命题时借助经验与记忆，不忘记引用自我的语境，并且以后者来修正一种在前的理论。因此它的目标不仅是以自传文字为介质“收集”吸纳历史、理论、语言与哲学，而是希望能够在自身的经验中积累和提出理论问题。用自传式的方式去阅读和修正在此之前的理论，也是一种“迟来者的修辞学”。

写作的经验中存在着一种似非而是的历史性，作家对驱动他的历史语境或者对他所改造、置换的历史传统天真无知，即使如此，他的写作是否就不去处理历史？受本身历史充分制约的、蕴涵历史意义而且反映历史主题的文本，能够提供给人们在离它们本来的时间地点十分久远的历史环境中阅读，“它既能够在语境的整体中扎下根基，又能即刻地将非饱和的语境转向语境重构。这一切完完全全是历史性的。”这意味着一个文本是可以重复的，就是说，文本“没有单纯的起源，也就是没有纯粹的独特性”，它们能够即刻分解并且重复自己，能够被移植到不同的语境之中而继续具有意义和效力。那些看起来“分解”作品的构思、修辞、结构与节奏，这才是最终“保持”最有趣的东西，才是作品，才是署名：这是主题学枯竭之后依然保留的存留者。“不是说文本因此就是非历史的，而是说历史性是由重复性构成。没有重复性就没有历史，而且，这种重复性也是使轨迹在整个环境或环境的某些因素阙如的情况下继续起作用

的东西。”除了经验世界的变化、一次性和历史语境的移动，我们也同时拥有一些非常稳定的语境因素：这些可资利用的因素通过语言的能力、通过专有名称的经验和仍然具有相同功能的类属结构的经验等，允许进行解读、改造和转换。

好的文学批评包含着一种行为，“一种文学的署名或副署、一种语言的创造性经验，它是在语言之中的，是在所读文本的范围之内的阅读行为的记录。这一文本永远不允许自己被彻底地‘客观化’”。德里达说，“我们必须为那些属于文学同时又损害文学的界限的‘批评’发明一个名称。总而言之，我不想去区分‘文学’与‘文学批评’，但我也不会去同化写作或阅读的一切形式。”他说，假如我必须回答一个不同的论争，或者“副署”一个不同的作品，我会就同一个话题写出完全不同的内容。“签署——但用的是副署并力图用另一种方式回答另一个人的署名的署名——我的法则，我试图致力或响应的法则，是他的文本，它的独特性、它的表现方法、它的领先于我的魅力。但是，如果我用另一个署名签署，使我的独特性起作用、作担保，我只能负责任地作出反应（而且这符合一般性法规，尤其是道德）；因为副署是通过肯定他人的署名、而且还通过一种全新的启动的副署的签署而签署的，两者同时进行，就像每一次我都用再签一次的方式来肯定我的署名：每一次都用同样的副署，而每一次都不同，是又一次的，在另一个日期。”

德里达论所说的“署名”与“副署”，“文学”与“批评”之间的关系可以隐喻性地移植到迟到者的修辞学中来，变成一种处理西方理论“领先于我的魅力”的方法。在迟到者的理论写作中，西方理论已经是一个先在，就像文学批评之前已经先在的文学文本。批评是留给迟到者的权利。就像用德里达所说的“副署”的方式去回答另一个人的“署名”，副署是对他人领先的魅力的认同，是对他人问题的回应，但副署启动了自身的经验、独特性，启动了自身相关的“事件”和与自身记忆相关的“日期”，使用个人经验与记忆，在他人的理论上以再签一次的方式副署，来肯定自身的署名。这的确意味着德里达上面所说：假如我必须回答一个论争，或者“副署”一个作品，我会就同一个话题写出完全不同的内容。

虽然德里达论述了独特性文本的可重复性，对它的置换和语境的转移，在此过程中修辞、结构、节奏的重要，可他的回答也是双重性的和对立的。文本的独特性与独特性的经验有关。一部作品只发生一次，而且永远不会被置换，“这种独特性、作品的日期与署名，使得对历史、环境与风格的关注成为必需，而不是相悖。这里所说的不是那种记在作品外部边界或周围的日期与署名，而是构成或建成作品主体的、处于‘内’与‘外’之间的边缘的那一种。”“情况永远是某种混合状态，事件的独特性就是独特的东西与它的重复、反复之间的一种独特关系的发生”。副署是一个不纯的身份，是通过阅读而进行的署名，通过一种写作与阅读之间的抗争，分享“独特性”，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副署跑来既肯定、重复并尊重另一个的‘原’作的署名，同时又将它引离他处，因此就冒背叛它的危险，为了尊重它才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去背叛它，创造同样独特的另一个署名。”因此一个副署不可能绝对地属于新的、起始的，它包含着一种非创造性的重复与惯例的因素。

自传式的理论写作是一种在问题和解释方面的迟到者处境的需要，它是理论场域中的迟到者写作的一种必要的修辞学。由于我们的社会历史被强行地被动卷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世界所遭遇的问题早于我们，在问题没有成为我们自身经验的时候，尽管我们可以在知识上谈论它，终究缺少问题的

切身性，当我们以变形的和滞后的方式经验到问题的现实性时，有了长期积累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有了许多对此类问题的系统解释。无论是问题还是解释，还是问题出现的处境和解释语境，资本主义世界都比我们首先遭遇与应对，因为是我们上了“别人的”历史轨道，理论尤其是主义（系统的理论）的滞后性就似乎“永久性地”成为我们的命运。就像我们的现实与历史本身就是西方的一个不象样的摹本一样。由于这样的处境，在我们所模仿的语境内，我们难以提出什么理论或主义，不要说我们的理论旅行到西方，我们自身、我们的同时代人和同行也不相信我们会产生可信的理论。

然而我们的被动历史、经验的混杂和异质性，以及历史命运的滞后性，确是一份独特的经验，它伴随着更复杂难言的感受，这些经验与感受，处于未被理论化、未被加以学术命题的幽暗之中，它深藏于我们个人的感受与经验之中，这就是我注重引用自身经验、社会和个人生活情景的动机之一，将我们复杂的、碎片的、多样的历史引进理论语境，进行初始的理论化，坚持把我们自身的经验和历史语境作为理论思想的经验基础，以此修正纯粹学习到的理论，在理论与经验语境中建立起真实的关联，给理论写作一个我们自身的没有被言明的历史语境。参照自身经验是为了给理论的讨论一个语境，一个我们自身的社会历史语境，避免对问题的转移，避免以他人的问题置换和替代我们自身的问题。对他人理论的学习变成处理自身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取代自身的问题。理论从西方旅行到中国，它产生的问题语境已经发生了转移，它的批评对象也产生了错位。如果没有我们自身经验与感受的参照，没有把西方理论重新语境化，把理论批评的对象重新确认，没有理论与经验和历史的对话关系的重建，理论就成为纯粹的知识，失去了问题产生的历史意识和解释问题的能力。

我这里也在以副署的形式在德里达的文本上做另一次署名。批评写作在文学作品上副署的行为是一个隐喻，对我意味着，以副署的形式在先于我的西方理论问题上的署名。不仅一个历史性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民族的阅读经验中，被迫改变了语境，从而使作品重新置身于一种“非饱和的语境”中，使阅读和批评变成“语境重建”，在我们之前的西方理论一旦旅行到我们身边，也同样改变了其本来的历史语境和经验语境，置身与“非饱和语境”，不仅理论提出的背景发生了改变，它批评的对象和要解答的问题都发生了转移，它也要求我们进行理论的“语境重建”。自传性的理论写作意味着使理论在新的语境中的重新扎根。副署变成了我们几乎是“现在”永久的命运。我们必须以副署的方式赢得不同，赢得在问题上的自传式的署名。而在理论批评的写作中，引用我们的自传性经验可以成为我们副署一个在先理论问题的方式。

在题为《嗜好诡秘》²的一次访谈中，德里达再次谈到对自传式写作的理解：“在某种方式上，我对一个没有道德——生存的悲哀感的哲学家没有多大兴趣，这基本上是我年轻时从阅读卢梭、尼采或纪德中得到的愿望和承诺”。他说是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赋予主体性这个词的意义，“抵制生存变成概念或者体系，这正是我寄予极大重要性和深深感受到的东西，我一直准备维护的东西。——文学中使我感兴趣的实际上是自传性的东西——并不是被称作‘自传文体’的东西，而是完全淹没了自传‘文体’的自传性”。就像德里达所注意到的，决大多数自传体小说几乎都不是自传性的。

因此，对自传式的理论写作的兴趣，并不意味着自传体小说或者回忆录这样的文体，它没有给予这样的文体以特权，同样自传式的理论写作也没有给予作者的自我以优越性。它并不希望讲述个人的琐事，但却始终处在一种特殊的生存

²引自《差异》第一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经验中。德里达强调了“记忆”的功能，“希望保留一切事物的渴望，想把一切东西都积聚在记忆的习惯里。甚至要收集一切播撒掉的，按其本性无法收集的东西。在我看来，哲学或者不管怎样的学院哲学，一直都在服务于这项自传性的记忆设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哲学文体的特殊性。特别的哲学要求，它证明记忆的愿望，同时担负起对自己疆界的哲学责任——在我看来，重要的问题一直是关于谁的问题，可以把它称作传记的、自传的或生存的。关于谁的问题对于我至关重要，它是以克尔恺郭尔的、尼采的或者海德格尔 (Heidegger) 式的样子出现吗？谁？谁提出了关于谁的问题？在哪里提的？怎么提的？什么时候提的？谁来了？这总是最困难的问题。”德里达在这些范畴中考虑传记、自传和记忆，以及对问题的署名。

我私下里想，要在理论书写中更多地引用自传性经验，更多地把自传性的经验作为理论的书写语境。当然我不想讲哪年生，哪年上学，后来某一天怎么样了。但我想要让自传性的经验进入理论文本，这可以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理论滞后状况的补偿，对于一个要从事批评理论写作的人，这是“迟到者的修辞学”……我们来到理论场域的时候什么主义和观念都有了，它训练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然而我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表述。自觉地把个人自传性的经验和记忆纳入书写，通过迟来者的修辞学，把理论变为一种写作。也许这只是为了多多少少使我们的理论批评具有一个问题上的自发性。这个问题对我还有吸引力。如果没有它，仅仅是一些符合学科规范的写作或者传播知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内心的梦想。

我一再引用的德里达的梦想现在成为我的梦想，“我现在仍然是，并且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地梦想写一部作品，它既不属于哲学又不属于文学，甚至也不是由哪一个混合而成，同时又保持着——我不愿意放弃——对文学与哲学的记忆。当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怀有这种梦想，一种成为恰好没有先例、没有先建制的建制的梦想。人们会说，这是每一部文学作品的梦想”。这样的梦想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将它完全客体化，就像我们自身不会彻底被客体化一样。